

迈克尔 W. 阿普尔，当代世界著名的教育思想家。在书中，阿普尔以其敏锐的洞见、犀利的笔锋、优雅而严谨的语言分析了美国教育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其雄辩的风格阐明了构建更为民主的公共教育的可能性。

# 文化政治与教育

Cultural Politics and Education

[美] 迈克尔 W. 阿普尔 / 著 阎光才 等 / 译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Series  
教育、社会与文化译丛

译丛主编 / 朱红文 劳凯声 金生鈇 阎光才

教育科学出版社

教育、社会与文化译丛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Series

# 文化政治与教育

## Cultural Politics and Education

[美] 迈克尔 W. 阿普尔 / 著 阎光才 等 / 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责任编辑 郑豪杰  
版式设计 贾艳凤  
责任校对 贾静芳  
责任印制 曲凤玲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政治与教育 / (美) 阿普尔著; 阎光才等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5.8  
(教育、社会与文化译丛 / 朱红文等主编)  
ISBN 7-5041-3190-3

I. 文... II. ①阿... ②阎... III. 教育-研究-美国  
IV. G5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6304 号

---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市场部电话 010-64989009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电话 010-64989419  
传 真 010-64891796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75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字 数 149 千

印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印 数 1-5 000 册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译者序

你站在谁的一边？

阿普尔 (Michael W. Apple) 在中国教育学术界应该说早已是声名远扬，这位与弗莱雷 (Freire)、吉鲁 (Giroux) 和麦克莱伦 (McLaren) 等一班被贴上“激进”标签的批判教育学学派代表人物齐名的学者，更以其桀骜不驯、特立独行的个性和风格而著称。不过很有意思的是，阿普尔本人对于这一标签却从来不予认同，甚至对于人们所冠之以“批判教育学” (critical pedagogy) 的帽子也一概拒斥。在他看来，“批判教育学”之谓总难免带有一种学究气，它很容易让人感到是躲在象牙塔中、一批所谓有批判倾向的学者们所精心建构起来的一个“巢穴”或者学术堡垒。而他本人所从事的是批判教育研究 (critical educational

studies), 不仅是批判的, 更是实践取向的。对于“学者”之谓他也了无兴致, 而始终自誉为一位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工作者。因而, 这在学院圈子中显得很有些“另类”。

的确, 从他个人复杂的经历中我们也不难理解这一点, 从早期作为一所内城(往往为贫民窟所在地)以贫民子弟为主的中学的教师, 到如今作为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的一名在欧美学术界很有影响的资深教授, 阿普尔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教育的第一线。他做过反映学校日常生活中人们抗争精神的电视节目, 曾长期担任教师联合会的主席。从1979年第一本代表作《意识形态与课程》(*Ideology and Curriculum*)到《国家与知识政治学》(*The State and Politics of Knowledge*), 被人们称为阿普尔三部曲的八部知名作品, 几乎每一部都是直面现实、声讨“右派”的檄文, 带着暴烈的火药味, 展示了一个对现实绝不妥协的批判教育家和民主斗士的形象。

阿普尔的多数作品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后。80年代后的美国是一个“向右转”的时代, 从里根上台到如今小布什的成功连任, 至少表明到目前这种右转局势还在延续。用阿普尔自己的话来说, 这可谓是一个右翼大奏凯歌的时代, 一个美国民主正面临严峻危机的时代。这一时代的标志是右翼共识风行, 推动这一共识形成的两大思潮是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然而, 其推动者却绝不仅仅是如克里斯托(Bill Kristol)、本奈特(William J. Bennett)、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弗里德曼(M. Friedman)、哈耶克(F. A. Hayek)、诺齐克(Robert Nozick)等这些所谓新保守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言人, 而是在同一霸权意识形态保护伞下的众多形形色色的群体。他们包括“热心于经济及其相关制度的‘现代化’、处于统治地位的经济和政治精英; 不相信国家而关心安全、家庭、传统知识和价值, 并属于一个被称之为‘专制民粹主义者’(authoritarian populists)中日益活跃的一部分的大量白领阶层和中产阶级群体; 诸如威廉姆·本奈特(William Bennett)一类要回到‘高标准’、纪律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竞

争的经济和文化保守人物；不完全与其他群体意见一致的新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但其职业利益和地位依赖于责任、效率、管理程序等他们自身所拥有的文化资本的广泛利用”。

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群体。他们虽然彼此之间在利益和价值诉求上并不完全相一致，甚至其中不乏一些对于把自己划为“右派”阵营极为反感的人，然而，在不同领域中立场的相似性却最终把他们推向了同一条战壕。他们的偏好虽各有不同，但是所假想的敌人却是共同的。这一敌人就是福利国家及其所有被认为是公共的物品、有“自身利益最大化”偏好的政府、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被他们视为“堕落的、混乱无序的”多元文化主义，等等。而美国的公共教育系统可谓是集以上所有之“大恶”者，因此，它也便自然首当其冲地成为以上所有右翼群体共同讨伐的对象。在阿普尔看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等国家所有指向公立学校的改革运动，诸如择校、学券制、公立学校私营化、国家课程、全国考试，等等，便是右翼们借改革之名而开历史倒车、逆民主潮流而动的一系列具体措施。这些措施的纷纷出笼，不仅进一步强化了精英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导致受压制群体的更趋边缘化（阿普尔不愿意使用“弱势群体”这一概念，在他看来，“弱势”用语很容易让人感觉，底层群体的不幸是其自身的原因而不是各种内外压制性条件造成的），而且造成美国社会原本就存在的等级、族群、文化认同等内部冲突和裂变进一步加剧，以至于在当下的美国，任何一个公民在涉及公共事务时，都不得不首先摆明你的立场，即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站在谁的一边？”

在阿普尔看来，对于每个关心社会正义、平等、人道、个人尊严和安全的人们而言，在如今右翼得势的时代，回答这一问题显得是那样地迫切和需要。否则，受压制群体的话语权和自身利益会进一步遭受剥夺，其命运愈加悲惨。对于那些自称为“自由派”的知识分子而言，如果继续恪守所谓的中立原则，沉醉于象牙塔内的所谓纯粹学术研究，他们就会愈来愈脱离现实，不仅失去自己在公众社会生活中的

发言权，甚至面对保守主义的强大攻势，他们在学院中苦心经营起来的既有优势，也存在被彻底瓦解的危险。而要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首先需要进行严肃的理论和实践反思。在此，自我反思固然必要，但阿普尔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去反思右翼种种话语及其改革议程背后的意识形态成分。这种反思是历史性的、道德性的和超越学科建制性的。

阿普尔所谓的历史性反思，就是反思在不同时代右翼话语所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语境。正如他在对右翼所一贯强调的“个人责任”和“回归家庭”分析中指出的，右翼所谓的个人责任是基于一种美国式的个人主义和独立性的信念。这种信念形成于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为克服殖民地时期人们心甘情愿的臣服心态，开国元勋们刻意赋予“依赖性”以一种耻辱的标识，即它代表着“人格存在缺失”。也正是由此开始，随着一系列如奴隶制、妇女合法权利等制度性障碍的破除，“依赖性”也就被赋予越来越强烈的“个人化”色彩。于是，在今天，右翼们就以此为主臬，把所有社会福利性保障制度一概视为偏袒人性之“恶”的“大恶”，它纵容了“懒惰”与“邪恶”，是美国整个社会低效运作的渊藪。既然“穷人们”的“贫穷”完全是他们个人的“过错”，他们就纯属“咎由自取”。阿普尔针对这种带有种族主义倾向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准则抨击道，岂不知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在历史过程中一系列外在的压制性条件的累积性结果，这种外在的条件就是美国社会从过去至今始终存在、并在今天有加剧迹象的种族、阶级、性别和性倾向等差异。右翼一再强调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所有的美国人都是移民，包括其原住民印第安人也不过是亚洲后裔。因此，“我们”所有人都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认同。这种浮丽的话语却掩盖了历史的真相，例如，同欧裔不同的是，非裔是戴着镣铐来到美洲大陆的，奴隶制的制度性障碍虽然破除了，但在盎格鲁-撒克森的主流文化——一种意识形态霸权的控制之下，他们包括其他族群依旧是受压制的“他者”。正是在由这种文化意识形态霸权所左右

的压制性条件下，穷人总是被他者化，并继续着边缘化的命运。

阿普尔针对新保守主义所倡导的“回归家庭”主张而分析道，新保守主义的“回归家庭”实际上就是回归所谓浪漫的维多利亚时代。这一时代中所谓“男人主外、女人主内”的核心式家庭被他们矫饰和美化了。事实上，对于妇女而言，维多利亚时代有着极其惊人的残酷性。一种所谓的“济贫院测试”制度曾经在英、美以及澳洲等国家风行。它的假定就是有些人是先天不可救药的，这种测试的目的就是把这些人从穷人中分离出来。如果你接受救助，就要被贴上“不可救药”的耻辱标签被收留到济贫院中，从事各种繁重的劳动。如此以来，那些被遗弃的妇女，或者未婚母亲以及穷人家的妇女，就不得不在耻辱的“救助”和无法谋生间作出选择。新保守主义所谓的“回归家庭”就是回归这种“济贫院测试”的非人制度。他们指责有关妇女保障制度是保护穷人们的邪恶本性，认为如今美国穷人妇女之所以一个个生孩子，无非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救助，甚至认为穷人之所以出现离婚率高的现象，是因为他们夫妻之间存在骗取救助的阴谋。然而，就是这种带有父权中心主义倾向、罪恶昭彰的“回归家庭”诉求，却被新保守主义赋予回归传统伦理价值、传统美德的漂亮外衣。

故而，阿普尔认为，至少在策略上，我们应该向右翼学习。即同样从道德的角度来反思右翼的社会议程及其教育改革主张。在他看来，教育本身就是一项道德性的事业。新保守主义在认同新自由主义淡化国家控制、实行教育市场化、推行可选择性改革的主张同时，转而又举起回归传统价值的大旗，强调国家课程和全国标准化考试实施质量控制。其本质是借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建构，来强化自己的精英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一个批判的教育研究者不仅要有内倾的视角，即从一个学科或知识本身来理解规训的历史，最为重要的是要有外倾的视角，去把握教育内部如课程、教学方式和改革与外部社会各种力量间的关系，特别是课程与意识形态霸权之间的密切联系。反思新自由主义表面上宣称价值中立，仅关注教育人力资源供给和效率至上，实



则是与新保守主义共谋的本质，即以所谓不涉道德判断的“只有让富人更富才能让穷人变富”、“非人道行为本身是通向美好明天的捷径”等宣称把不平等合法化的企图。从真正的社会公正、平等、人道和人的尊严角度，审视所有的社会改革和教育主张，他进而提出，在当前右翼改革口号盛行的时代，或许我们恰恰需要的不是激进盲目的改革，而是一种“非改革主义者的改革”。这种“非改革主义者的改革”是需要我们抑制改革的冲动，退后一步，对其进行冷静的道德意义的思考。

这种道德意义的思考是建立在对教育与外部社会间权力关系的反思基础之上。它所借助的学术资源，在阿普尔看来，是跨学科建制或者说超越学科建制的。正是这种跨学科建制，让阿普尔难以认同强贴在他身上的任何标签。的确，任何标签都无法清晰标明阿普尔的身份，他反对宏大叙述的结构主义观、简单的经济还原论，但是并不等于彻底否定结构主义。例如，他并不完全反对马克思主义，并认同新葛兰西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理论；它反对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过于强调“多元性”、“异质性”和“地方性”的主张，认为它淡化了种族、阶级、性别等差异的结构化特征，但并不反对后结构主义的“身份政治”、“权力的多元”和“非还原分析”等理论；他反对在“语言学转向”中的社会学和文化研究领域所有一切都是“文本”、以文本研究替代严酷现实的研究倾向，但并不反对文化研究关于话语、文本背后所深嵌的权力结构分析方面的洞见，特别是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关于大众文化的理解；此外，诸如女性主义和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等等理论资源都为他所批判性地接纳，但他又认为其多少扭曲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他赞赏教育中正在兴起的叙事研究，但对于其中存在的有闲白人阶层的孤芳自赏倾向又表示出隐隐的担忧。正如杰瑞利（James M. Giarelli）在其为《文化政治与教育》一书所写的序中所言，阿普尔还继承了由杜威所创建的进步主义民主政治和学术批判传统。

的确，对于阿普尔，人们是无法把他归类的。他不是一个“自由派”人士，但是他从未放弃美国杜威进步主义民主教育的传统，始终倡导学校政策实践中民主的实验，即通过“设计一个有助于公众讨论、辩论和协商”的机制建立起一种扩展政治（extend politics）；很难说他是一个激进“左派”，但是，他又认为在关涉美国公共教育制度改革议题中，不能不考虑存在于辍学和“问题”（in risk）学生背后的阶级、种族和性别等结构性的差异，以及葛兰西主义的文化与意识形态霸权。正如他所认为的，因为税收基础的瓦解（富人纷纷迁往郊区），内城已经成为新的“保留地”，右翼的改革议程加剧了内城与郊区间的差异和隔离，其结果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他通过列举大量的经济数据而不无讥讽地说道，自20世纪80年代“右转”以来，随着各种救助计划的削减，美国的贫困人口急剧增加，少数族裔和妇女的地位进一步跌落，这种“贫困化”的恶果是犯罪率增加，青少年失足比例直线上升。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宁肯一年花上3万美元在监狱中增加一个床位，却不肯提供区区3800美元的救助满足一个孩子完成学业的要求。他甚至更为尖刻地说道，右翼在攻击公立学校辍学现象时，可曾考虑到这些孩子之所以没有机会完成高中学业，正是因为结构化的经济条件造成的。因为极度贫困以及就业环境恶化，他们大多数人往往在毕业前不是进了监狱，就是在暴力事件中被枪杀。

针对右翼所提出的国家课程和全国考试议程，他利用新葛兰西主义理论评析道，这其实是右翼强化其文化和意识形态霸权的一个部分。他们漠视美国不同族群间的文化认同差异，试图以高质量、高标准的名义把白人中心主义文化凌驾其他之上。而这里的其他是“他者”，与“我们”是不同的。他援引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理论分析道，在右翼的假定中，“我们”是高尚的、纯洁的、无私的和正义的，而“他者”则是低级趣味的、污秽的、自私的和邪恶的，是大众的“铅灰色的海洋”。显然，在这种议程背后所隐藏的玄机是一种文化的政治学动力机制，其最终目的是维护霸权文化的再生

产。为此，他对萨义德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政治的诸多洞见颇为认同，即追溯美国历史中的多样性，以及这种多样性对美国社会民主政治的价值。但是，他反对萨义德“幼稚”地期望主流文化对其他边缘文化的“慷慨包容”，认为这其中存在着让保守主义政治、白人主导文化充当其他一切“最终的审判者”的危险。因此，他主张，对于白人主导文化，直觉告诉我们，要敢于说“不”！

阿普尔对“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垒窝筑巢”学究方式非常反感，但是他也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相反，对于当下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他极为不满。针对在右翼势力节节进逼的情势下，他颇为辛辣地讥讽道，这些人大多也不过是“受雇佣的专家”，勉强称得上是现实的批评者。但是，他们大多数人充其量除了玩弄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玄奥辞藻，如萨义德所言的在九重天上飞来飞去，并把后现代理论作为其愤世嫉俗的解构工具之外，实在别无所长。在他看来，对于后结构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理论，如果我们能够严肃对待，并把它同现实的文化政治权力联系起来，它会成为批判教育研究的有效建设性工具。这就是，在日常教育生活中，戳穿霸权意识形态在微观政治学意义上的隐秘压制真相，强调多元文化与权力的认同，唤醒底层（教师、学生、社区成员、活动分子）自觉抵制意识，致力于地方性的与右翼间不懈的斗争。

总之，在门派林立的学术界，阿普尔可称得上是一位极其复杂、很难归类的人物。他的学术来路极其广泛，正是利用各种看来存在种种内在张力的理论资源（阿普尔并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它们是可以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的），他盘桓于不同理论之间、游刃有余地缕析了美国右翼文化、政治、经济与教育间极其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他的矛头所向是美国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右翼政治及其教育主张，但是，他的视野并不囿于国内，正如他所言，美国的右翼政治文化与当代全球化话语及其议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在《文化政治与教育》一书中，他开篇就以一个炸薯条的故事，讲述了在全球化的运行机制

中，西方跨国公司（麦当劳快餐店）是如何通过炸薯条这样一个“廉价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象征物，来剥夺发展中国家农民利益的（占用大量平原土地，进行现代机械化的土豆种植和收割，驱赶农民背井离乡，成为城市中的边缘人，可谓是早期英国资本主义“羊吃人”的现代翻版）。因此，他不无担忧地暗示，英美的右翼文化政治及其影响，其实也正在成为整个世界人们生活体验和阅历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部分。

或许，这也提醒了我们，在已经被纳入到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在一个一切向美国看的时代，在一个教育市场化话语喋喋不休的语境中，在一个教育差异已经外溢为一个严峻的社会公正问题的情势下，我们是否也需要有一点“非改革主义的改革”意识，退后一步，停下来从社会公正、道义和个人尊严角度冷静地想一想；紧接着，也扪心自问：“你站在谁的一边？”

在一个市场与教育结合越来越密切的今天，或许我们应该多听些批判的声音。批判本身不是目的，正如阿普尔所言，它是一种关于教育民主和为了教育民主的实践。正是因为存在这一共同的教育目的，所以，把阿普尔的批判话语引入到我们的教育研究中，是有着现实意义的。本书的翻译就是基于这一目的而进行的一种尝试。

另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在翻译之前，就已被纳入到研究生讨论课中。我个人负责第一章和第五章的翻译，硕士研究生彭欣光、左继容、傅书红、张碘分别对前言、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进行了细致的解读和翻译工作，由我最终对各章进行全面的校阅。因此，它属于集体的贡献。

因为存在文本的跨语境性以及翻译者自身的素养问题，本书翻译过程之中难免存在诸多不足。我们不胜浅陋把它呈上，也寄望于方家能予以指正。当然，书中如果出现了某些疏漏乃至严重的错误，一切责任当由我来担当。

本书作者阿普尔教授对整个翻译的进程始终表示了特别的关注，并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保持了频繁的联系。他专门为本书所作的中文版序，对于中国读者了解他所有的著述、他的学术理路以及一贯的学术立场会大有裨益。

译 者

2005年5月

于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

## 中文版序

关于教育，有一个重大的问题要求我们必须作出回答，这就是斯宾塞很多年以前所提到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在许多关于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著作中，我发现人们都一再地重述这一问题。所有涉及这一议题的复述都指向课程与教育社会学研究所关注的中心。而在大量而广泛的知识中，只有某些知识及其组织形式被宣称为是合法性的，或者是“官方的”（official）。因此，甚至于在教育所担当的最为实用的责任方面，对于“我们到底应该教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也有着它深刻的文化政治基础。但是，课程的政治并不仅仅在于知识本身，它还涉及谁来选择它，它是如何被组织起来、被传授、被评价的，以及谁才应该来提问和回答这些问题，等等。

然而，仅仅这些还远远不够。官方知识是

在某些特定机构中被传授的，这些机构有它们自己的历史，有各种的冲突、政治经济以及等级化内涵存在，并有官僚化的需要和利益存在。因此，我们在思考课程的同时，也是在思考它的内在与外部脉络(contexts)。无论我们的意愿如何，只要谈起课程就会谈到权力。在更深层次上，教育本身就是一个这样的场所，不同的集团在此基于自己社会的、文化的和宗教的目的，竞相致力于建立自己的霸权。当然，在课程研究以及教育社会学中，关于教育与权力间关系的认识由来已久。究其本质而言，与这些议题相关的最有成效工作是比较性的，因为要充分理解教育中权力的内部与外部运作，把某个国家或地区与另一个国家或地区想当然的东西进行比较无疑是一种最好的方式。

比较是非常重要的。尽管你将要阅读的这本书所涉及的是大量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但它对于中国的研究者和教育者，了解人们对各地如美国广泛兴起的改革的批判，是很有意义的。虽然具有不同的背景，但不同国家间改革策略不加批判地输入乃至套用实在太普遍了。这些改革在理论上看起来很好，但是，它们本身在自己的国家中却很可能受到激烈的批评并存在众多的争议。因此，我希望我在本书中关于教育与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力之间不同关系的批判性分析，能让你退一步，并立足于自己国家的情势好好反思一下。

让我就《文化政治与教育》在我所有著述中的位置说上几句。一些有关我作品的评论把我所有的著作称为“三部曲”。它们注意到：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我的第一个阶段的著作涉及的议题是霸权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和对霸权意识形态的抵制，以及我们必须关注到的各种权力扩张；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我第二个阶段的著作更为关注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运动。第一阶段的著作包括《意识形态与课程》(*Ideology and Curriculum*) (1979年初版，1990年再版，2004年第三次出版)、《教育与权力》(*Education and Power*) (1982年初版，1985年修订版，1995年再版)、《教师与文本》(*Teacher and Texts*) (1986年出版)；第二个阶段的著作有《官方知

识》(*Official Knowledge*) (1993年初版, 2000年再版)、《文化政治与教育》(*Cultural Politics and Education*) (1996年出版)、《以“右派”(正确)的方式教育》(*Educating the “Right” Way*) (2001年出版)。

而第三本《以“右派”(正确)的方式教育》是对第二阶段前两本著作观点的系统化, 它又与另一本《国家与知识政治学》(*The State and Politics of Knowledge*) (2003年出版)相联系。它扩展了批判的观点, 并通过采取个案研究以更具体的方式审视了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在国际背景中的运作, 同时探讨了其介入的权力关系。

作为三部曲的第二部中的一个文本, 《文化政治与教育》聚焦于理论的、经验的、政治的和教育的脉络, 并探讨了两方面的内容。第一, 它进一步完善了细微观察的视角, 以便于更好地理解教育与权力间的关系, 因为这种关系非常复杂并不容易化约为简单的理论。它结合了葛兰西主义理论、文化研究的学术资源以及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 与此同时又不放弃对经济和物质条件真实权力的审视; 第二, 它运用一系列理论去揭示, 在一个众多国家中的教育机构备受攻击的时代, 社会和文化权力在教育内部与外部的运行方式。

当然, 我的每一本著作都可以单独阅读。然而, 我们必须认识到, 在本书乃至在所有著作中的分析是不仅仅由政治的、文化的、教育的理论和研究的新发展激发而形成的, 这一点至关重要。作为前教师协会的主席和一位致力于经济、社会和教育平等运动的活动家, 我的这些分析也得益于我自己以及众多为此而努力的其他人在持续行动中所带来的启发, 这些行动无论是个人性的还是集体性的, 它们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这个世界更美好。我希望我的探讨同样有助于扩展中国同行们对社会和教育公正的理解, 并为此而承担责任。

迈克尔 W. 阿普尔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课程与教学、教育政策研究教授

2004年11月



## 英 文 版 序

约翰·杜威曾这样写道：“智力方法的充分和自由运用存在一个客观前提，即在一个这样社会里，畏惧社会试验的阶级利益都被统统废除了。这一点与每一种社会和政治哲学及其活动是不相协调的，也与所有认可社会中阶级组织存在及其阶级利益合法性的经济制度是不相协调的。”<sup>[1]</sup>

杜威的分析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实质上，都体现了什么才可被恰当地称为公共教育哲学的典型特征。在杜威一生的工作中，他总是竭力主张这样一种教育探究方式，即通过立足于经济、政治、文化及学校教育间联系的思想，来理解公众生活的形成（*formation*）与再形成（*reformation*）过程中的问题，这是教育探究专业模式的开端，不妨说也是它的结束。